

方志物产史料的价值、利用与展望

——以《方志物产》为中心

包平¹ 李昕升^{1,2} 卢勇¹

(1.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物产”是方志必载之门类,可以追溯到先秦,体例形成于宋,完善于明。抄本《方志物产》是1950年代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主任的领导下,辑录、整理国内近九千种方志的专题性资料,是世界上唯一一套方志物产史料集成汇编,其价值在于鸿篇巨制、再造古籍、检索便利、真实可靠等,是不可多得的方志物产类编,利于各方面历史研究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工作开展。新时代的史学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清晰的思路、更细致的史料,应用日益兴起的数字人文技术来深度挖掘该《方志物产》,将实现古代文本与情报学、信息科学的完美融合,把我国的古籍数字化与方志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关键词】《方志物产》;万国鼎;价值;利用;展望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3-0117-10

The Value and Utiliz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Products in Local Chronicles

——Take *Products in Local Chronicles* for Example

BAO Ping¹ LI Xin-sheng^{1,2} Lu yong¹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Products" are the categories of Local Chronicles must be recorded,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 Qin period and form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perfect in th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Wan guo-ding(万国鼎) who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room, collected of the thematic data of nearly nine thousand kinds of local chronicles in China, wrote the *Products in Local Chronicles* in 1950s is the only one se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world. Its value lies in the huge structure, the reengineering of ancient books, the convenience of the retrieval, the truthfulness and so on. The compilation of *Products in Local Chronicle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era needs a broader view, a clearer idea and more detail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sing Digital Humanities to the deep excavation of the products in local chronicles will realize the perfect fusion of the ancient text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ill make

【收稿日期】2018-03-29

【基金项目】中国农学会教育教学类第五批科研课题“传统农业文化对构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意义”(PCE1612);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方志内容挖掘及知识组织研究”(KZD20140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洲救荒作物本土化与社会经济影响研究”(17LSC004)

【作者简介】包平(1964-),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籍数字化;
李昕升(1986-),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讲师,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卢勇(1978-),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水利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the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study of the chronicles of our country to a whole new height.

Keywords: *products in local chronicles*; Wan Guo-ding; value; utilization; prospect

有“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之称的方志,历史时期究竟修过多少,已经难以统计,因方志亡佚特别严重,如现存明志 1014 种,仅总数的 29%^①。传世的仍有大约在万种左右,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可谓大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历来为人所称道,其特点之广泛性、地方性、时代性、资料性、和连续性等决定了其超然的地位,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源。

方志是历史研究的必需文献^②,方志以志为主体,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在历时性的维度下对特定区域的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③进行描述和记载。林林总总,包罗历史研究任何领域,其中的“物产”几乎一直是方志必载之项目,简称方志物产^④。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序言中说方志“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⑤,瞿宣颖先生在《方志考稿》自序中指出“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⑥,均可见方志物产的不可或缺性。因此学界对方志物产研究颇多,早在民国战前农史学科的奠基人万国鼎先生(以下简称万先生)就已经开始了对方志中农业史料(主要指物产)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惜在抗战中佚失;1980 年代游修龄、沈璐等先生^⑦发文呼吁进行方志物产的挖掘;近年来又有衡中青、王新环诸君^⑧前仆后继,方志物产研究的地方化和个案化趋势明显,以上仅是就宏观而言,如果论及方志物产史料的具体应用,则是恒河沙数不可量及,甚至可以回溯到清代。

一、方志物产与《方志物产》的源流

顾名思义,方志物产作为一地的动植物资源(部分方志物产也包含货物,如矿物资源),方志物产

- ① 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中国地方志》2004 年第 4 期。
- ② 因宋代是方志体的成熟时期,体例基本定型、内容趋于完备,此后被称为“方志阶段”,此前的“地记”和“图经”阶段,重要性不足与“方志阶段”相颉颃。
- ③ 《纂修志书凡例》(永乐十六年颁降),原载正德《莘县志》卷首。
- ④ 方志物产是一概称,盖因“物产”作为该类目最为频繁,其实“物产”之外还有 20 余别称,如宋元志多称“物产门”,明志多称“土产”,还有方产、方物、庶物、民物、产业等不一而同,但本质殊途同归。
- ⑤ 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第 15 页。
- ⑥ 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天春书社,1930 年。
- ⑦ 游修龄:《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图书馆研究》1980 年第 3 期;沈璐:《谈谈农史研究中方志的利用》,《农业考古》1990 年第 2 期。
- ⑧ 衡中青、侯汉清:《农史物产史料来源探微——以各类史志书籍相关记载为例》,《中国地方志》2008 年第 8 期;衡中青:《中国地方志物产分类方法研究——以明、清、民国广东方志物产为例》,《全国第五次情报检索语言发展方向研讨会论文集》,2009 年,第 215-223 页。王新环:《志书中的物产资源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中的柿子为例》,《中国地方志》2015 年第 5 期;王新环:《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为例》,《史志学刊》2015 年第 1 期,等。芦笛:《近代地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文本信息组织——以上海官修方志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2014 年第 5 期;芦笛:《唐、宋、元三朝方志所见大型真菌物产和资源》,《食用菌》2014 年第 3 期,等。李昕升等:《农史研究中“方志·物产”的利用——以南瓜在中国的传播为例》,《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史明文:《〈新疆图志·物产志〉探析》,《新疆地方志》2014 年第 2 期。彭兵、杨庭硕:《酉水流域优质建材绝迹的社会历史原因探析——兼论方志“物产志”的生态史料价值》,《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江燕:《从物产史料角度看滇池周边的环境变迁》,载《徐霞客研究》,地质出版社,2010 年,第 17-25 页。

是方志中记载农业最多、最集中的部分,其他门类如风俗、民生甚至诗文等多少也会涉及,但“物产”无疑是方志中与农业最密切相关的部分,是农业的核心体现。这在以农立国的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无论是研究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或多或少与农业发生联系。

方志物产历来有之,在方志的雏形《禹贡》和《山海经》中已见眉目。《禹贡》以地理为纲,将天下分为九州,着重阐述了“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贡品名目占了相当的比例,约见 70 余物产;《山海经》更是记载 599 种物产^①。此后在方志中记载物产日广,宋代中关于物产门类的设置成为标榜,明代方志物产则成为定例,清至民国时期是方志物产的集大成阶段。总体而言,历史时期方志都有或简或繁的记载物产,从单纯作为内容的一部分到专列类目记物产,从只记载物产之名称到物产之下详加解读,从传统话语的物产概念和书写方式到与时俱进的分类体系和描述方式。

虽然物产体例是随着时间推移渐趋完备,但并不代表后来者篇幅是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细致,只能反映一种整体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从汉代以来诞生了一大批的物产专志(包括了异物志和博物志),如东汉《南裔异物志》、隋代《诸郡物产土俗记》等 70 余种,非常专业、深入;一方面方志物产的内容多寡存在地区差异和编撰者的理念差异,如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献元代《析津志》记载物产之详尽不亚于民国方志。

我们知道农业史料主要来源于农书、方志、本草类著作中,兼有正史、笔记、小学类文献补充。而农书在古籍中比例并不大,这从《四库总目》仅存 19 部农书就可见一斑,根本原因是制度使然,帝制社会虽然重视农业,但不重视农学,没有专门农学家的生存空间,农书的产出归根结底是士人的自发行。

前文已述,方志是古籍的大宗,那么方志物产就非常可观了。1924 年万先生主政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时就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计划辑录古书中有关农业的资料“片段的农学记载”,汇编为《先农集成》,开始了方志的搜集工作,在 1933 年已经收藏有关方志 2104 种,当时仅次于京师图书馆和东方图书馆^②。同时针对方志物产撰写方志考,大概有数百篇之多^③,存放地后被日寇占领,1949 年后全部散失,不知所踪。近期我们获悉“金陵大学战前藏书以地方志及丛书为大宗,尤以全国方志农业小册最珍贵,其中部分图书被劫往日本”^④,至今未还,令人痛惜!但是,无论如何,万国鼎先生当是方志物产系统整理与利用的第一人。

1954 年丁家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旧址的一场大火焚毁了部分房屋,劫后从火场清理出战前积累的农业史资料,辑录自古农书 860 余种 3700 万字以上的资料^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1955 年万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个国家级农业历史研究机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以下简称农遗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主任,重启了“先农集成计划”,万先生将农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开发、研究、利用多管齐下。虽然之前的方志不存,万先生毫不气馁,重新开始方志搜集,这次直接以查抄的形式开展。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伊始就开始方志的查抄工作,首先从南京开始,1956 年又派员去北京,形成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两个中心,查抄工作除了倾全室之力农遗室本身的十余名研究人员之外,还从社会上雇佣一批文字工整、有阅读古籍能力的老年人,临时工最多时有近百人,除了北京、南京不到十个图书馆外,为求查抄工作全面,还派人奔赴除西藏、新疆、青海等几个边远省份之外的几乎

① 贾雯鹤:《〈山海经〉专名研究》,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 46-88 页。

② 王思明、陈少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记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万国鼎教授》,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5 年,第 372 页。

③ 万国鼎:《中国农业史料整理研究计划草案》,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 317 页。

④ 孟国祥:《日军对中国图书的掠夺与利用》,《团结报》2015 年 11 月 19 日第 7 版。

⑤ 截至 1937 年,这些资料装订成册,是为《中国农业史资料》456 册,多是用毛笔工楷摘抄,少数常见文献直接剪裁。

是全国范围内所有公私古籍收藏单位查抄方志^①,足迹遍布 40 多个大中城市和 100 多个文史单位,到 1958 年查抄方志工作基本完成,1959 年整理,1960 年初编成《方志物产》449 册、《方志综合》111 册、《方志分类》120 册,共 680 巨册 3600 余万字。成为今天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镇院之宝。

万先生要求抄写工以查抄方志为主,同时附带查阅笔记杂著等古籍,分类整理成《中国农业史资料续编》157 册共 1540 多万字的资料,与《中国农业史资料》456 册合计 613 册,几乎囊括了经史子集所有农史资料。从 1956 年就开始分批次整理这些资料,与查抄工作齐头并进,编印《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分类集中,选编各个专门问题的资料专辑,分为甲(植物各论)、乙(动物各论)、丙(农事技术)、丁(农业经济)四类^②,在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出版了稻、麦、粮食作物、豆类、棉、柑橘、油料作物、麻、古兽医方集锦九个专辑。《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下编)》拟利用方志,计划分为 112 个专辑,方志是大头。方志资料整理完成后便计划出版下编,如马万明先生就被安排编写《棉(下编)》^③,1963 年万先生不幸离世,紧接着又是十年浩劫,计划便一直搁浅下来。

文革之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陆续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之常绿果树、落叶果树以及带有上编性质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历代茶书汇编》《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下编出版了两个集子,即《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下编·稻》和《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虽部分成果题目有所变化,但蕴含了万先生的精神内核,并一以贯之。

二、《方志物产》的价值

《方志物产》以方志物产史料为核心,方志材料的拣选原则大体上是以编辑《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的需要为标准,主要辑录各种农产品,即方志物产。《方志综合》则是摘录方志中物产之外的类目所见物产史料,数量不多但过于分散恐不能一网打尽,可作为《方志物产》的补充。《方志分类》则是按照《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的体例,分门别类的进行编排,内容源自《方志物产》,属于《方志物产》的深加工产品,可以说是《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下编)》的预备作品,但因只进行了部分工作,完整性不及《方志物产》,价值大打折扣。要之,《方志物产》价值最大,也是我们对其大书特书的原因。

抄本《方志物产》是为海内孤本,如此大规模的工作放在今天亦是千难万难,在国学淡泊、学风浮躁的今天,再难以纠结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来从事这项功在将来的基础性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完成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万先生在不同场合均谈及“这项工作是可以传之久远最有价值的工作”,在万先生去世后半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更能深刻理解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这是万先生的理念“有为者高瞻远瞩,随时随地,择善坚持,而不较一日之短长。不怕当前困难,不计一时得失,常作五年十年的打算”的真实写照。

《方志物产》取材于方志,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成书之后国内外许多学者慕名前来查阅,包括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国内前来索阅者更是不可胜数,几乎以农史为研究志愿的学者都有前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经历,《方志物产》与《中国农业史资料》及续编被称为“红本子”而闻名学界。仰仗这些“红本子”也培养了曹树基、萧正洪、王利华、王建革等当代史学大家,如长江学者王利华教授就饱含深情的回忆“一度雄心勃勃的想要从人的生物属性和自然环境因素出发重新解说中国史,于是利用

① 章 楷:《回忆万国鼎先生和四十多年前的查抄方志工作》,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 402-403 页。

② 万国鼎:《〈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总序》,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 361 页。

③ 马万明:《谆谆教诲 令人感怀——回忆万主任与我面对面谈心》,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 407 页。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所珍藏的大量动植物文献,开始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①,从而构建了中国环境史的理论体系。正是老一辈先生不计较个人得失给我们留下了配藏名山之财富,才造就了今天的丰硕成果,我们在高山仰止之时,不禁也思索能给后人留下什么。下面对《方志物产》的价值做一些学理求索。

(一) 鸿篇巨制

《方志物产》在万国鼎先生一手组织策划下,近百名成员被动员起来,采撷了当时所能见到的约九千种方志,洋洋数百万言,蔚为大观。

空间维度上,方志物产地域来源广泛,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行政区划,装订成册的编排顺序是全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含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含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四川(含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含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含海南)、广西。最多的是四川,大约在500种左右,最少的是西藏17种。

时间维度上,从宋代到民国,以北宋熙宁九年(1076)《长安志》为始,以民国三十八年(1949)《定西县志》为终,将宋代以降旧志统统涵盖,其中元代最少为13种,清代最多有4400种左右。

内容来源上,除了传统总志、通志、府志、厅志、州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乡土教科书、山志、湖志、关志、图志外,还有一些罕见或新型或广义方志,如诸府县志物产集、少数民族志、民国调查资料、地区志(合志、小志、散志、杂志)、地理志、风土志、物产志,无所不包、力求全面。

一言以概之,《方志物产》基本将国内的方志物产资料一网打尽,堪称最全,毫无疑问是目前最大规模的中国地方志物产资料集成。

(二) 再造古籍

《方志物产》微观上是按行政区划编排,宏观上是实实在在的类编,堪称方志物产类书,而且手稿《方志物产》是独一无二的古籍,可以起到再造古籍之作用。

首先,《方志物产》辑录于1956-1958年,这三年众多知识分子几乎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很多方志已经不存,即使一些数字方志库和稀见方志丛刊汇编的工作已经开展,也是珍本难觅,《方志物产》则很好的保存下来了众多方志物产记载,成为海内孤本,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高唐州志》、崇祯五年(1632)《固安县志》、万历6年(1578)《交河县志》等。

其次,《方志物产》是方志物产的全面集成,并不是简单的资料罗列,在查抄完成后也是经过了分类编排、悉心录目、装订成册,较影印工作量更大。1961年之后陆续又有《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编》《江西地方志农产资料汇编》《甘肃河西地区(中部干旱地区、陇南地区暨天水市)物产资源资料汇编》《广西方志物产资料选编》《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出版,一方面揭橥了方志物产价值的重要性,否则各省也不会前仆后继,但是在史料完整性上不及《方志物产》,且有错讹,价值不大。2013年出版的《明清农业史资料(1368-1911)》三卷本176万字,较《方志物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但和《方志物产》雷同的方面则难出其右。又如爱如生在方志数字化方面国内领先,但也仅有五千种方志。所以《方志物产》是国内非常罕见、完整的资料汇编类古籍,其史学价值和珍贵程度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三) 检索便利

方志物产采集完成后仅整理工作就花费了一年有余,就是为了索引方便,《方志物产》剔除了查抄的重复情况,按照资料性质、省府州县乡的区域位置、方志编纂年代的先后,分类编排,每册正文第一页均配以悉心撰写的目录,让读者一目了然,万先生长期在图书部工作,并发起过“索引运动”,被称为近代索引的先驱。以江苏一册为例:

^① 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史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封面题:《方志物产》309 江苏 25(即《方志物产》总第 309 册,是为江苏第 25 册)

12-1	丹徒县志	清·光绪 5 年(1879)	1 页
	丹徒县志摭余	清·光绪 16 年(1890)	103
12-1	开沙志	清·康熙 51 年(1712)	105
12-2	丹阳县志	明·隆庆 3 年(1569)	113
	丹阳县志	清·乾隆 15 年(1750)	132
	丹阳县志	清·光绪 11 年(1885)	182
	丹阳县续志	民国 16 年(1927)	187
12-3	溧阳县志	明·弘治 11 年(1498)	190
	溧阳县志	清·嘉庆 18 年(1813)	195
12-4	金坛县志	清·康熙 22 年(1683)	196
	金坛县志	清·光绪 11 年(1885)	242
	金坛县志	民国 12 年(1923)	244
13	江宁府志	清·嘉庆 16 年(1811)	245
13-1	建康志	宋·景定 2 年(1261)	246
13-1	金陵新志	元·至正 4 年(1344)	248
13-2	江宁县志	明·正德 14 年(1519)	259
	江宁县志	清·康熙	276
	江宁县新志	清·乾隆 13 年(1748)	284

12 是江苏第 12 府之意涵(镇江府志在第 308 册),12-1、12-2、12-3、12-4 均为镇江府下辖县,所列年代为不同时期方志的成书时间。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经纬结合,查阅容易,极大的节约了查检时间,提供了短时间内不可能搜集到的史料,更是引领青年人进入了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举一反三开阔了视野,掌握了初级索引学、目录学的基本功。

(四)真实可靠

有人或许会质疑《方志物产》的正确率,根据笔者多年的整理与利用情况来看,《方志物产》的正确率基本是 100%。这与万先生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人员认真严谨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万先生对查抄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万先生一再叮嘱奔赴图书馆进行查抄的工作人员,除做好管理事务外,要时时抽查所有抄成品,有没有应抄的材料挑选时遗漏了、错抄漏抄的字校对时有没有改正?^①此外,万先生在利用查抄资料分类汇总时再一次进行比勘和考订,责任到人,以专责成。所以《方志物产》绝大多数都是校对过的,几乎在每册我们都能看见红笔校对的印记,造就了《方志物产》的错讹率几乎为零的神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志物产》也是剔除查抄重复后的精品,重复的方志在整理时也经过了一一核对。

《方志物产》格式都是按照原有志书类目、体例、行文,原封不动抄录下来,全部文字皆为竖行排列、繁体汉字,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笔者因研究需要,曾经辑录出《方志物产》的瓜之属数千条目,与籍古轩“中国数字方志库”(影印)进行比对后发现全无错误,正确率高于爱如生“中国方志库”(文字)。

(五)其他

当然《方志物产》不是没有缺憾,就是仅汇编了农产品史料而没有顾及农村社会、农业经济、自然灾害等大农史文献。当然万先生如此行事也不是没有他的考虑:如果皆有所包势必必要延迟查抄方志的完成时间,不利于统筹安排和计划行事,只有及早完成这项工作方可在全国范围内利用这些资料,展

① 章楷:《回忆万国鼎先生和四十多年前的查抄方志工作》,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 402 页。

开对祖国农业遗产的研究;事实上农业部也指示把这些资料加紧补充整理出版^①。

今天看来如果延长工作时间,就会遭遇万先生的逝世与十年浩劫,该工作一旦中断再难连接,对《方志物产》是毁灭的打击。《方志物产》内容均集中在方志物产,不易出错,便于核对,完整性好,而《方志综合》则太过零碎,校勘较难不说,也容易断章取义。

三、《方志物产》的利用与展望

《方志物产》的内容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并不是仅列物产类目那么简单,一物产下往往配有相应的文字说明,涉及引进、推广、形态、习性、用途、采收、猎捕、种植、加工、利用等方面,而以动植物品种资源和相关的种植饲养技术为主,系统性很强。

农史研究基础史料来源就是《方志物产》,造就了一批的研究成果^②。在生物学史、经济史、环境史等领域均有较多建树,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这些均是史学应用研究,即将《方志物产》作为一手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论调,这是目前对《方志物产》利用的主要方式。但也兴起了数字化技术应用、分类信息的管理研究等,丰富了学术生态。

(一) 史学应用研究

万先生早就鲜明的指出:辑录古籍上有关农业的资料,方志最为大宗^③。不言而喻,剖析《方志物产》最为方便农史、生物学史的研究,这是老生常谈,不再赘述。

其实《方志物产》对经济史的建树并不弱于农史等研究,前言索引顾颉刚、瞿宣颖先生的话语均可以见方志物产与经济态势之紧密联系,物产本就与“货殖”、“食货”息息相关。如《方志物产》中记载各类作物的亩产、面积、价格等数据是进行传统约简式计算的珍贵指标,可以还原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其中不乏对耕作法、种植制度等的记述体现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及其规律,是研究经济发展史的绝佳材料;往往包含的重农思想、农学理论、农业经营思想,这类农业思想体系可以充实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产品的供销记载,可以析清当地的经济类型,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与转型阶段,对于验证今天的经济理论和对今天的经济影响大有裨益,如论证“过密化”理论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还要更多的从《方志物产》着手。

近年来兴起的量化历史研究,就是在数据史学指导下充分发掘方志物产的一种新型经济史研究方式,美洲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颇受青睐^④,他们利用经济学模型对数以千计的方志物产史料

① 万国鼎:《〈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总序》,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362页。

② 以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成果为主,宏观的如:王宝卿:《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1368~1949)》(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胡义尹:《明清民国时期辣椒在中国的引种传播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何红中:《中国古代粟作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李昕升:《中国南瓜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等,微观碎片研究满坑满谷。

③ 万国鼎:《〈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总序》,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第361页。

④ Nunn N, Qian N. The Columbian exchange: A history of disease, food, and idea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0: 163-188; Jia R. Weather shocks, sweet potatoes and peasant revolts in historical China.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4, 124(575): 92-118; Chen S, Kung K S. 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3, 21(1): 1-29; 陈永伟、黄英伟、周羿:《“哥伦布大交换”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对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的一项历史考察》,《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何祚宇、代谦:《雾霾中的历史阴影——美洲作物引入、清代人口爆炸与生态环境的长期退化》,(北京)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论文集,第571-614页。

做回归性分析,来证明物产变迁导致的这样那样的社会经济影响,是一种新型的跨学科研究取向,值得借鉴。

环境史是名副其实的新史学,以研究历史时期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中国本土的环境史研究多脱胎于农业史或历史地理专家。朱士嘉先生在提到方志四个有利于其一就是:“便于了解该地区人口的增减、物产的丰歉,动植物和水族生长、迁徙、灭绝的情况和规律”^①,换言之,《方志物产》具有环境史史料价值,其记载的动植物资源状况就是有待于被提取的环境结构要素,物产就是人与自然发生互动的主要展演舞台。《方志物产》反映了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的何种环境资源以及人们如果利用这些资源来满足自身的生计所需^②。

《方志物产》的研究有助于“复原”过去时代的农业环境,每一个特定的时空断面的物产分布都是最基本的,它们所构成的景观正是往日一个个时间断面业已日渐消失的物产地理面貌之基本图景。因此利用方志物产史料向新兴学科环境史转向是一个趋势,这在前言的综述中已经体现。

(二)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信息技术应用研究包括数字化、智能化整理与利用等,将之应用到《方志物产》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目前主要由图书馆学、信息学的专家操刀,形成了侯汉清团队和包平团队。事实上万先生长期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本就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传承了万先生的衣钵。

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首先建立在对庞大《方志物产》数字化的基础上,可喜的是,在十年前王思明教授团队将《方志物产》数字化转换的工作完成(主要是文献扫描成图像,并转换成电子文档,同时进行文献标引和元数据编目),解决了文本保存的问题,实现了在线查阅、检索(未出版和面向社会开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方志物产》数据化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史料的收集、整理、识别、关联、展示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转变方志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除了具有基于超链接的浏览阅读环境和强大的检索功能外,还需具有研究支持功能,即能够提供有关方志内容本身科学、准确的统计与计量信息,提供与方志内容相关的参考数据、辅助工具^③。

侯汉清团队的衡中青博士以毕业论文为代表的系列成果,通过模式关系识别《方志物产》广东分卷当中的引书、异名别名,并基于识别出来的物产名称、异名别名、引书等命名实体信息,做了详细的分析研究^④。

包平团队的朱锁玲博士毕业论文为代表的系列成果,在衡中青博士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命名实体识别技术,通过模式关系对《方志物产》广东分卷中的物产名称和地名进行识别,并使用GIS技术对物产的变迁进行了可视化的展示^⑤。李娜博士在对适用于《方志物产》知识组织的相关技术进行了探讨^⑥;以山西分卷为个案,结合中国传统分类方法,辅助计算机技术,构建一套符合《方志物产》自身特点的物产分类体系,实现类目名称的智能化规范处理^⑦。

信息技术应用到《方志物产》暗合了数字人文文献计量应用的潮流,使得《方志物产》不再是孤立的、平面的资料,而是成为一个立体的学术信息知识库。作为后起之秀,该方向大有可为。如目前多是

①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

② 方万鹏:《〈析津志〉所见元大都人与自然关系述论》,《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6期。

③ 李国新:《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展与任务》,《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1期。

④ 衡中青:《地方志知识组织及内容挖掘研究——以〈方志物产·广东〉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⑤ 朱锁玲:《命名实体识别在方志内容挖掘中的应用研究——以广东、福建、台湾三省〈方志物产〉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⑥ 李娜等:《基于〈方志物产〉的古籍知识组织路径探析》,《古今农业》2016年第1期。

⑦ 李娜、包平:《基于〈方志物产〉的物产分类体系智能化研究》,《中国农史》2016年第4期。

研究《方志物产》各省分卷,集中在广东、福建、台湾、山西,其他省份没有涉及,如果上升到全国视野,就能广泛连结到更大的知识价值。

四、余 论

立足于《方志物产》的利用前景,我们最后再谈四点看法,是为展望《方志物产》的全新推进思路。

第一,《方志物产》可见某一物产的很多别名仅存于历史时期我国部分地区,大部分名称已经消失,但是对其不同名称进行梳理、理清其命名缘由等问题,可以更好的认识历史时期该物产在我国的引种推广史、时空变迁历程,因为最能体现某一物产推广过程的地方名称往往只有几个,物产在传入某一区域后,其获得的名称在一定语系、一定时空内具有较明显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是物产推广过程中除基因表现之外最稳定的标记之一,我们可以命名为“名称共同体”。根据《方志物产》中作物地方名称的记载和演变,可以对其推广的时空路径和时空差异进行分析,从而勾勒出某一物产在中国推广的时空变迁图景,梳理出直观、连续的发展历程,全方位、动态的展现物产在中国的动态分布全貌,一个物产的生命史也就呼之欲出了。

第二,尽管部分《方志物产》所记之物产极其简略,如仅举出作物品种的名称等,但有点记载,就等于在时空的坐标上标起一个位点,积少成多,汇集成一个了解和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其变化的宝库,可以从中钩沉规律,重现失去的历史信息。尤其可以借助 GIS 手段直观展示,突破了传统的文字表述模式的桎梏。

纵轴上看,历时性的看一部方志的物产是反映该地这个节点的物产状貌,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参照标准,即是上一个节点累积之结果,也是下一个节点因袭发展之基础,需要进行贯通的解读,才能把握一地物产的时间变迁。横轴上看,一个场域价值不高,但是如果将视界放在全省乃至全国的范围内,对于研究物产的分布等情况,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重现物产在中国的引种、推广、主产区、产区变迁等历史图景。

第三,在《方志物产》的语料下深入挖掘我国古代的农业文化遗产,对古为今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收集、保护宝贵的种质资源等方面还有更高的价值,通过《方志物产》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历史时期各地优良品种资源及其分布情况,利于我们保存保存地方品种资源,建立“种质资源库”。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有如此丰富的品种资源和可供研究的描述。

对方志物产记载的物产品种资源的梳理,明晰品种分布的地域性及其某些规律,可使之具有现实意义。以南瓜品种为例,“盒瓜”在方志中的最早记载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会同县志》,“盒瓜”一称只存于广东方志和海南方志,可见“盒瓜”是海南会同县(今琼海市)在清代中期培育而出的南瓜新品种;同样,“闽清酒坛瓜”(酒坛金瓜)最早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的《闽产录异》:“酒坛瓜。亦金瓜之别种,长大如坛,重六七十斤,疮、疥不宜”^①,民国《福建通纪》又载:“酒坛瓜出福州,亦金瓜之别种,长大如坛重六七十斤”^②,总之,可知“酒坛瓜”应是在清末福州一带最先产生的品种。

第四,数字人文日渐兴起,可利用信息技术与知识组织方法,保存、挖掘与利用《方志物产》的信息锁链,形成可整理、可关联、可拓展、可展示的新史料和新史实。运用计算语言学、文献学和信息科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研究方志史料,创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一方面通过《方志物产》的知识组织,研究方志史料的知识聚合与知识发现;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基于关联数据的物产知识库、面向数字人文研究的

① [清]郭柏苍:《闽产录异》,岳麓书社,1986年,第55页。

② 民国十一年《福建通纪》卷83《物产志》。

《方志物产》知识服务平台,推进特色馆藏资源的数字人文研究与应用。

总之,深度挖掘《方志物产》的史料价值,尤其是采用数字人文技术对之进行全方位的开发与利用研究,形成智能化处理与知识组织、知识聚合以及知识服务的提升,将实现古代文本与情报学、信息科学的完美融合,把我们的古籍数字化与方志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参 考 文 献]

- [1] 王思明,陈少华.万国鼎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5.
- [2] 游修龄.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0,(3).
- [3] 衡中青,侯汉清.农史物产史料来源探微——以各类史志书籍相关记载为例[J].中国地方志,2008,(8).
- [4] 沈璐.谈谈农史研究中方志的利用[J].农业考古,1990,(2).
- [5] 李娜,白振田,包平.基于《方志物产》的古籍知识组织路径探析[J].古今农业,2016,(1).
- [6] 李娜,包平.基于《方志物产》的物产分类体系智能化研究[J].中国农史,2016,(4).

~~~~~  
(上接第74页)

#### [参 考 文 献]

- [1] [苏联]瓦维洛夫.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M].董宇琛,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 [2] 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与意义[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 [3] [日]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M].高桂林,等译.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87.
- [5] [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M].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 [6]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635—1834 年[M].区宗华,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 [7] 王加丰.五百年来的地理大发现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1997,(2).
- [8] 郭爱民.英国农业革命及其对工业化的影响[J].中国农史,2005,(1).
- [9] 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J].中国农史,2004,(1).
- [10] 张兰星.稻米在北美大陆的栽培与传播[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 [11] 梁茂信.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移民性质新论[J].历史研究,2011,(2).
- [12] 徐杨,张箭.马在美洲的传播初探[J].海交史研究,2017,(1).
- [13] 王涛.明至清中期中国与西属美洲丝银贸易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拉丁美洲研究,2011,(2).